

诠释与重塑

基于社会文化学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

方波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诠释与重塑

基于社会文化学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

方波 著

责任编辑：毛 羽

责任校对：朱 奇

责任出版：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与重塑：基于社会文化学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 / 方波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503-1208-1

I. ①诠… II. ①方… III. ①王羲之（321-379）—书法—研究 IV. ①J292.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3233号

诠释与重塑——基于社会文化学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

方 波 著

出 品 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6.5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字 数：230千字

印 数：0001—2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208-1

定 价：56.00元

詮釋與重刊

丙子五月
祝遂之署檢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社会文化学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课题编号：12JCWH06YB）”成果，由中国美术学院重要学术成果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唐代以前关于王羲之其人及作品的记载	007
一、《语林》《世说新语》等文献中的王羲之形象	007
二、南朝宋、齐书学文献对王羲之书法和逸闻的记载	015
三、萧衍、陶弘景等梁朝君臣对时风的倡导：从二王到钟、王	019
四、收藏与毁佚	027
五、王羲之在书法之外的位望	032
第二章 唐人视阈中的王羲之形象及作品	036
一、《晋书·王羲之传》对王羲之形象的塑造和定型	036
二、帝王之好与民众之好	039
三、《兰亭序》书法作品的出现、集字风气的形成	043
四、与王羲之有关的轶事与传说	049
五、唐代前期书论对张、钟、二王的评价	054
六、盛中唐书论对张、钟、二王的评价	056
第三章 宋人对王羲之形象的建构及对王羲之书法的认识	062
一、与王羲之有关的地理遗迹	062
二、有关王羲之传说的演变	068
三、宋代丛书、书学文献、地方志等所载王羲之传记及其意味	074
四、朝廷力量的又一次干预：《淳化阁帖》的刊刻	081
五、从北宋书家对《淳化阁帖》的批评看其对王羲之书风的理解	

.....	086
六、《兰亭序》刻本的流行	091
七、北宋文人对取法王羲之的认识及实践	093
八、北宋文人对王羲之个人形象的评论	097
九、南宋君臣对王羲之政治、道德形象的建构	101
十、南宋理学家对王羲之的态度	108
十一、南宋《兰亭序》热与南宋人的书法取法观念	115

第四章 十三世纪末期至十四世纪文人对王羲之形象及其书法的接受

.....	120
一、对王羲之的祭祀及其意味	120
二、对王羲之政治、道德形象的接受与南人的政治、文化诉求	124
三、元代南、北方书家对如何取法王羲之的不同认识	128
四、论笔法传授谱系	134
五、元人视阈中的二王书法图像及风格	143
六、内擢与外拓：元人对二王笔法的描述	145
七、兰亭雅集的遗响	148

第五章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文人对王羲之及其作品的态度

.....	153
一、明人对王羲之政治、道德形象的评论	153
二、明人对王羲之笔法的分析及对取法途径的论述	157
三、王羲之在社会一般层面影响的淡化	164
四、明代及清初书家对《兰亭序》《圣教序》等的评论	172

五、理学语境下对王羲之的另一极评价：项穆的“王书大统”论	178
六、得右军一体与王羲之书法一线单传观念	182
七、一线单传观念的分化与流派意识的产生	186
八、严分正偏的书法统系意识	188
九、对“法出二王之外”的关注及审美趣味的改变	191
第六章 十八世纪以来书家对王羲之及其作品的态度	194
一、一线单传观念的嬗变与北朝石刻的经典化	
——碑学成因研究的新视角	195
二、帖学书家对王羲之传世书作的评论	199
三、对传世王羲之书作、书论的非议与否定	208
四、对王羲之与碑学关系的建构	214
五、清末民初学者眼中的王羲之及其书迹	
——以杨守敬的论述为例	220
六、“内擫”、“外拓”涵义的拓展与近现代的碑、帖融合之势	225
结 语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51

绪 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被誉为“书圣”，其人其书对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崇王（羲之）”观念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观念之一，从王羲之所生活的东晋时期直至一千多年后的民国，“崇王”观念一直与书法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贯穿于书法史。即使在当代，这种影响仍然在延续。对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进行深入研究，可使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观照书法史，相对准确地了解古人眼中的书法以及书家是何等形象，了解王羲之个人和书法形象形成、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对书法发展的实际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书法史，更好地把握书法传统的内涵，并促使我们对当代书坛的诸多现象以及书法的前景和走向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流传于世的王羲之相关资料较多。后世文人关于王羲之知识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正史以及其他各类史书的记载。二、蒙学书籍、类书、民间传说、地理遗迹、公共建筑中所包含的王羲之故事。三、历代文人对经、子、史籍所作的笺注以及文人专集中所包含的王羲之资料。四、专门的书学、画学著作中对王羲之及其言论、作品的记载与评论。五、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包括摹本、临本墨迹如《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集字碑刻如《集王圣教序》《兴福寺碑》等，单刻帖如《兰亭序》《黄庭经》等，丛帖如《淳化阁帖》及其衍生刻帖中所收录的王羲之书迹等。六、与王羲之有关的绘画作品中所包含的相关信息。在这些资料中，《兰亭序》、兰亭雅集、鹅、墨池等是后人关于王羲之的记忆中最常见的文化符号。

对于普通文人来说，他们主要是通过文本途径、书法途径来获得关于王羲之的知识。东晋以来，后人所能获得的王羲之相关文本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正

史、类书、笔记、地方志、文人专集等文献的记载以及后世文人对前代诗文所作的笺注等，早期可能存在的关于王羲之的一些口头传说，在后世的流传中也大多被固化为文字，存在于文人笔记、地方志甚至官方正史中。历代文人的诗文集、笔记中常常载有王羲之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多是承前代文献而来，经过诗文、笔记的作者的加工、裁剪，又以文献的形式流传于后世，也成为后世文人了解王羲之的知识的来源。

写字是古代文人的必需修养和技能，几乎所有读书人从蒙学时期起就开始接受习字训练。普通文人特别是书家们在长期的习字训练中，也会接触到一些王羲之的书迹资料，并逐步建立起关于王羲之书法的基本知识。尽管这些书迹资料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并不一定能反映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但这并不影响古人关于王羲之书法形象认识的构建。

刻帖风气的形成、坊刻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有关王羲之的史料的传播，载有王羲之有关资料的文本被大量刊印、王羲之书迹被大量传拓，广泛传播，对“崇王”观念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唐代以后，传播王羲之资料最普及、最有效的途径即是大量刊刻的类书、史书和刻帖。

流传于世的王羲之书迹能在较大范围产生影响、成为普通文人识读王羲之书法的资料的，主要是刻本，如《集王圣教序》《十七帖》《黄庭经》《乐毅论》《兰亭序》《淳化阁帖》及其翻刻本以及其他刻帖等，这些都是书家重点关注和评论的对象，摹本、临本墨迹因其稀缺和珍罕，大多被当作王羲之真迹而被朝廷、显宦或声名显赫的收藏家所收藏，虽也有可能对部分有特殊地位、身份的文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面是非常狭窄的。

王羲之的刻本书迹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样本，但人们在学习王羲之的这些书法样本时，会从中获得一些与王羲之有关的文献学知识，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文辞内容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在临习王羲之作品的过程中熟悉了王羲之帖语的内容和典故，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评论和运用。从唐代以来文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少文人对王羲之书帖、信札的内容是很熟悉的，经常在自己的诗文或其他著作中直接引用或以典故的形式运用这些帖语。他们的这些关于王羲之信札、帖语的知识，一方面来源于对王羲之书

法作品的直接学习，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在学习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基础上再去进一步查阅专门书学著作中的释文和阅读类书、文章总集、选集中所收录的文辞。记载王羲之书帖、信札文本的文献主要是《法书要录》《法帖释文》《法帖通释》一类的著述以及宋、元、明人收载《法书要录》等内容的书学著作和书画著录书籍，总的来说，这些书学著作的种类不多，刊刻的数量较少，流传的范围有限^{〔1〕}。

对普通文人知识构成有重要作用的类书在传播有关王羲之的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类书可大致分为官修类书、文人私撰类书和书坊编刻的通俗类书等三类。官修类书和文人私撰类书的读者主体是帝王和文人阶层，通俗类书的读者是以市民、商人和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普通大众。从南宋以至清末，民间编刊的通俗类书如《事林广记》《书言故事》《万宝全书》等，无论数量、流传范围，还是社会影响，都远超官修和文人私撰类书^{〔2〕}。

相比较而言，专门书学著作的影响面要小些。普通文人的求学生涯是围绕科举进行的，他们所重点学习的是经子史籍、蒙学书籍、文人类书等，这些书籍中所包含的信息对他们知识结构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普通文人关于王羲之的知识也主要是从这一类书籍中获得的。这类书籍的刊印数量要远远大于专门的书学著作^{〔3〕}。只有对书法有特殊兴趣者才会去关注专门的书学著作，从中获得更多的关于王羲之的知识。

〔1〕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用一整卷的篇幅收录王羲之信札内容。宋人所著《法帖释文》一类的著作更多，据姜夔于嘉泰癸亥（1203）五月所作《绉帖平序》记载，有《刘氏释文》一卷、山谷《跋法帖》一卷、《评潭帖》一卷、秦少游《官帖通解》六篇、米元章《官帖跋》一卷、黄长睿《刊误》十篇、陈去非《校字释文》一卷、俞子才《潭帖释文》一卷，其他还有《法帖字证》二卷、《绉帖字鉴》二卷、《绉帖释文》等。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载有刘次庄《法帖释文》十卷、陈与义《法帖刊误》一卷、许开《二王帖评释》、施宿《大观法帖总释》、单纬《绉帖辨证》、佚名《法帖字证》十卷等。

〔2〕 有关类书的流别、用途、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可参见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张涤华《类书流别》、夏南强《类书通论》等著作。

〔3〕 关于古人印书数量的原始文献极少，钱存训通过活字本印数并参考欧洲“摇篮本”印数推断出一般诗文集和学术著作的雕板印数平均每板在一百部左右，翻刻重刊当重作写板计算。而经、史、小学、蒙求、字典、韵书、读本、参考用书、通俗读物以及民间应用的历日等，其数量当远过此数。参见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166—167页。

总的来说，历代文人所作的王羲之的传记资料以及对王羲之各方面的记载很少出现大的讹传和错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人对王羲之个人和书法资料的叙述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歧异，这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人获得王羲之资料的最终来源是比较固定和基本相同的。

无论是官方正史的记载还是文人著述、民间传说以及各类临摹本、刻帖，其本质都是历史记忆，其中有一些历史记忆因某种目的或机缘而得到文人强化，固化为历史，有的与某些特定的地理遗迹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些成为民众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有些被忽略以至被遗忘。同时，结合着某种社会背景、地方情绪、民众企求的需要，新的传说、新的评价、新的关注点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1〕}。由于王羲之在社会一般层面、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并不深远，他在民间口头传说、民间日用类书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且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有关王羲之的传闻逸事只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区域内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关王羲之及其书法的信息包括传说、逸闻，已经过历代文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加工，已经固化为文字和图像记忆，成为历史。唐初以朝廷名义所修的《晋书·王羲之传》，就曾将东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流传的王羲之的传说作为信史收入传记中，固化为历史。《晋书·王羲之传》所收录的王羲之有关资料以及唐、宋人所收集、摹刻的王羲之书迹资料如《兰亭序》《集王圣教序》《淳化阁帖》及其衍生刻帖等，成为唐、宋以后文人解读王羲之及其书法的最主要途径和资料来源。

古人关于王羲之的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王羲之个人形象的基本认识、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接受和评价。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研究立足于社会文化学的视阈，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对作为书家的王羲之形象的接受和对其书法的评价、诠释、取法；一是对作为士人的王羲之形象的评价、建构、重塑。通过对历代以来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关于王羲之个人形象及其书法作品描述的细致分析，来判断王羲之及其书法形象塑造、确立、层积、演化、变形的过程。

有关王羲之及其书法史料的范围和大致框架，在唐代即已基本确定，宋以

〔1〕 有关传说的理论可参见柳田国男著、连湘译《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后文人一般很少能增加新的史料，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既定的范围内根据需要对王羲之的众多资料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和编排。选取王羲之相关资料的侧重点不同，建构起的王羲之的形象和书法风格也会有所不同，这种选择更能体现出唐及唐以后处于不同情境的文人对王羲之及其书法的不同认识与不同态度，从而显现出对王羲之推崇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原因。作为一个被崇尚和接受的对象，王羲之实际上是不变的，但他对于后世不同时期、处于不同情境的文人以及普通民众的意味却在发生改变。因此，我们探讨东晋以来的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的流变脉络，实际上是在探讨隐藏于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中的、通过“崇王”观念所表现出来的书法观念的流变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因此，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的发展、“崇王”观念的流变并非单一的书法史问题，并非单一地与某一时代、某一地域对应，并非只有文人书家的参与，而是涉及到文化史、社会史的问题。我们在进行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和“崇王”观念的研究时，既要探讨文人的“崇王”观念、王羲之在文人群体中的影响，也要关注王羲之在社会一般层面中的影响，关注社会一般层面的“崇王”状况。我们既要关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对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状况的影响以及“崇王”观念的形成的推动作用，也要关注“崇王”观念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反馈作用。

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崇王”观念发展流变的基本脉络，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内又发生了怎样的流变，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群体特性、个人喜好等有什么样的关系？二是对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的文化精神内涵、结构模式、结构特性以及作用机制，即对王羲之及其书法的接受是否就仅仅意味着只是在书法领域对某个人、某件作品、某种风格的推崇？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模式和结构特性？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来进行传承、散发和产生影响的？不同地域、阶层的人是否存在不同的态度和接受方式？这种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对社会文化建构、书法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是什么？三是“崇王”观念的实践形态，即对王羲之书法的接受与书法实践是否是直接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是否存在以一种模式、一种风格压

制、阻碍其他模式、风格发展的情况？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接受对书法实践的发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与意义？古人对王羲之及其作品是怎样看的？是作为评判标准还是取法范本，还是审美理想？王羲之的人和书是否是一体的？王羲之书法是否即是书法好坏的评判标准？如果说王羲之使后代书家确立了书法艺术品评高下的标准，那么这种标准是从何时开始确立的？是如何确立的？

在展开论述时，我们重点关注王羲之及其书法接受史中的节点时期和节点问题，注重对东晋以来人们关于王羲之的知识的来源、对王羲之形象的建构、不同区域、阶层的人对王羲之的态度以及对古人的“崇王”观念的建构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对古人的种种认识和建构行为，即使是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是错误甚至是很荒唐的，也不作过多的价值评价，而是致力于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多角度地探讨这些认识和行为的内在逻辑性以及书法发展的关系。因为古人的这种认识、这种建构行为本身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第一章 唐代以前关于王羲之其人及作品的记载

从现存文献看，后世所流传的唐代以前关于王羲之的传闻逸事较早主要见于《语林》《世说新语》以及《论书表》等文献，这几部文献成书的时间与王羲之活动的时代相去不太远，其中的记载当有所依据。特别是《论书表》，是上奏宋明帝的，应该是不敢以轻漫之心待之的，所述有关王羲之的故事虽不能断定全部都是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

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则主要集中在书学文献中。羊欣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古今莫二”的综合评价，《论书表》则对二王书法古质、今妍之别进行了论述。而王僧虔与萧子良、梁武帝萧衍与陶弘景共论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优劣得失，有往来启答传世。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秉承萧衍推扬钟繇、贬抑王献之之旨意，分别对张、钟、二王等前贤进行评论与区别等级。

唐代以前文献的记载，既为后人描述了王羲之的个人形象，提供了了解王羲之有关事迹的途径，也可使我们通过分析这些记载的内容，判断其时人们对王羲之个人形象及其书法的评价和态度，并透过这些评价和态度的变化，去探索社会文化、审美风气、书法趣味的演变脉络。

一、《语林》《世说新语》等文献中的王羲之形象

对于唐代以前文献所记录的有关王羲之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确证其真实性，但这些信息却又构成了后人了解王羲之的基础性知识。因此，我们分析唐代以前的有关文献，并不是重点关注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王羲之资料的真实性，虽然真实性也非常重要。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文献的，如何记录、传播这些文献，在记录、传播过程中又作了哪些删改，这些删改又蕴含着怎样的意味。

流传到后世的关于王羲之的资料，最早的是东晋人著作中的零散记载，如

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特别是《语林》中有较多的与王羲之相关的记载。《语林》为东晋河东闻喜裴启作，辑录汉魏至晋代士人的传闻逸事，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不少内容为《世说新语》所取。《语林》早佚，但在后世文献中时有引用，今人通过辑录这些引用文献可间接窥见《语林》的部分面貌。

《语林》中有一些关于王羲之事迹的记载，如食牛心炙、与谢安纸九万枚、患有癲病并曾在发病期间作诗等，《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九所引《语林》对王羲之发病时作诗一事有详细的记载：

王右军少尝患癲，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询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瀨，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癲何预盛德事耶？”^{〔1〕}

唐代以前收录王羲之资料最多的文献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2〕}，至梁时刘孝标注作注，又补充了大量相关资料。《世说新语》对当时流行的有关王羲之的资料作了取舍，删去部分记载，并添加了一些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资料，对王羲之患有癲病并曾于病中作诗之事，《世说新语》中即未收录。何法盛《晋中兴书》、宋明帝《文章志》、王僧虔《文字志》等著作中也有部分关于王羲之的记载，刘孝标在为《世说新语》作注释时多加以引用。

《世说新语》原文及刘孝标注释所载与王羲之形象、事迹相关的内容散见于《言语篇》《文学篇》《方正篇》《雅量篇》《赏誉篇》《品藻篇》《规箴篇》《容止篇》《企羡篇》《栖逸篇》《贤媛篇》《排调篇》《轻诋篇》《假谲篇》《汰侈篇》《忿狷篇》《仇隙篇》，其中以《赏誉篇》《品藻篇》涉及最多，主要是与王羲之有关的逸事，包括日常的言论、行为以及时人对王羲之的评价等，多是倾向于描述王羲之的风度、气质等，与书法无甚关系，文中对王羲之历任的官职等也有记载，但对王羲之在任职期间的政绩并无详细的描述。《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王羲之轶事，最有影响的是“东床坦腹”和“兰亭雅集”的故事，其他还有“与谢太傅共登冶城”、“食牛心炙”、“与王述相轻”、“失郡誓墓”等。

〔1〕《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九，《四库全书》本。

〔2〕《世说新语》原题作《世说》，又作《世说新书》，此处依后世通行的名称，作《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等文献是后世的整理与记录，是一种事后的追忆，不可避免地参杂有该文献写作时的态度和观念。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王羲之的相关事迹，不管事迹的真实性如何，这些曾出现在唐代以前文献中的记载仍然构成了我们关于王羲之的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文献所收录的内容以及在收录之前所作的增删、取舍、加工等，剖析其时士人、民众对王羲之的态度。《世说新语》及其所引用的《晋中兴书》《文章志》《文字志》等，勾勒出了南朝士人眼中的王羲之及其书法形象。《世说新语》收录的资料中所蕴涵的对王羲之的态度，正体现出南朝梁时士人对王羲之的接受方式与态度。

在时人的评价中，王羲之小时候并不出众，“讷于言”、“甚涩讷”等语句是对他这时期状态的描述。稍长，他的与众不同处可能逐渐显露出来，成为琅琊王氏家族后起之秀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位列于“王家三少”之中，他的伯父王导有“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1]一类的感叹，叔父王敦赞其“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2]，刘孝标注所引《文字志》中也有“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3]的记载。在王羲之青少年时，有两件事一直被东晋、南朝人所乐道，一是“食牛心炙”事^[4]，一是“东床坦腹”事。前者说明当时名人对少年王羲之的器重，后者则描述出王羲之洒脱不羁的性格特点以及郗家对王羲之这种性格的赏识。比较而言，“东床坦腹”事在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世说新语》

[1]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82页。《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所引《郭子》也有类似言论：“祖士少道右军：王家阿菟，何缘复减处仲？”

[2]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第249页。

[3] 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第68页。

[4] 在《世说新语》中，“食牛心炙”事收在《汰侈篇》：“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刘孝标注云：“俗以牛心为贵，故羲之先食之。”而《晋中兴书》的记载则略有不同，更为详尽，《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八引《晋中兴书》云：“王羲之，字逸少，道之从子也。初讷于言，人未之知。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异之。时重牛心炙，座客未啖，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祁小春指出：周顗善待王羲之，当不唯因其才智非凡而已，应与王、周二家原本关系密切有关；少年时代的王羲之大概确有才智不凡的一面，故在当时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也是名至实归之事，但也须看到，赞誉中亦有为出仕而制造舆论宣传的另一面，故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都纷纷出场对王羲之的倍加赞誉；而当时针对王羲之的多数赞语，都贯穿一个“贵”字，正是高门势族对舆论产生强有力影响的一个缩影。参见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02—405页。